

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中国昌，郭媛媛

摘要：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学科自主为基础，以学术自强为内核，以话语自觉为桥梁，以道路自信为方向。其动力源于学科积淀的理论滋养、技术革新的方法支撑、文明对话的智慧启迪及国家战略的制度保障。在推进路径上，需立足本土并整合跨学科资源，推进知识生产；依托技术赋能与理论拓展，驱动知识创新；统筹主体构建与国际传播，促进话语转化；贯通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强化知识应用。由此，最终构建起具有学术主体性与文化生命力的自主范式，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科从理论依附走向自主创新。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1-0044-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因此，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要求，需明确其基本内涵，进而厘清动力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实践路径。

一、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内涵

（一）学科自主

学科自主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其实现依赖中国教育史学学科范畴的厘清及学科体系的系统建构。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经学科大学堂和师范学堂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1910年，由黄绍箕草创、柳诒徵辑补的《中国教育史》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专著，标志着教育史学科正式诞生。^②1925年前后，伴随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与民族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5年度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25BC0009）。

作者简介：中国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郭媛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

^① 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② 杜成宪、邓明言著：《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主义思潮持续升温,社会各界对“新教育失败”“新教育破产”的批判声浪持续发酵,至20世纪30年代仍未消退。中国知识界借此历史契机,通过对中外文明碰撞、传统向现代转型等核心命题的重新审视,依托现代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对近代新式教育展开全面系统的批判性反思。在此过程中,中国教育史学拥有了现代史学意识和相应的独特知识形式,完成了从传统学术领域向现代独立学科的实质性跨越^①,为学科自主奠定了制度、人才与学理三重根基。百年间,经过几代教育史学人的共同努力,教育史学科稳步发展。

作为兼具历史学与教育学双重属性的交叉学科,教育史学的学科属性可从三个维度阐释:从学科生成背景看,教育史学脱胎于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其学科发展脉络、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均根植于历史学传统^②;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史学聚焦教育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承载着教育学对教育规律、实践逻辑的探索使命,保留了教育科学的本质属性^③;从学科特征看,教育史学借助历史学和教育学的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学术张力和学术疆域,既可以通过历史学实证考据再现教育活动场景,又可以依托教育学理论框架挖掘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形成历史场景还原、教育经验提炼、当代价值转化相统一的研究范式。

(二) 学术自强

学术自强,即以中国教育问题为研究导向,扎根本土教育实践,推动学术观点表达、学术理论生成、方法论革新和学术传统赓续,提升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教育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狭义上,教育史首先是教育自身的历史。^④教育史学研究应聚焦教育的演进过程与发展规律,揭示教育思想嬗变、教育制度转型及教育实践创新的内在逻辑,以体现其教育学科特性。广义上,没有与人类的教学和形成有关的,是在教育史之外的。^⑤

具体而言,教育史学研究要着眼于教育与政治、文化等外部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范畴涵盖所有时期和所有地区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教育问题和教育活动。^⑥既要梳理典章制度的思想源流,也要关注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及其贡献,彰显教育史学研究的人民性面向。^⑦研究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方法论的差异。在方法论层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⑧,如借鉴年鉴学派和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将参与教育活动的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⑨,吸收新文化史学描述性的历史叙述特点,发展教育史研究的叙事范式与感知方法^⑩。在推进中国教育史学术自强的实践路径上,一方面重视从中国传统教育发掘本土学术传统,关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优秀教育传统,同时对民间教育智

① 于述胜:《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的中国问题——解读舒新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理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周洪宇主编:《教育史学通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③⑦ 杜成宪、邓明言著:《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96页。

④ 张斌贤:《教育史观:批判与重构》,《教育学报》2012年第6期。

⑤⑥ [美] 布里克曼著,许建美译:《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298、296—298页。

⑧ 张斌贤、王晨:《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机”》,《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⑨ 周洪宇、申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

⑩ 丁钢:《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教育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维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慧进行谱系化整理,系统提炼本土教育经验^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融合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整合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方法和计量史学、图像史学等实证研究方法,依托史料挖掘与数据库互证技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全面、辩证、独立地分析教育历史问题,推动教育史研究从经验叙事向理论构建的范式转型。

(三) 话语自觉

话语自觉的本质,是突破西方中心的局限,将外来理论置于中国教育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辨析与转化,完成对教育现象的本土化解读,提升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

话语自觉要以清晰的学科话语为方法论基础,以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为底色,运用中国思维范式进行话语表达。从学科属性来看,中国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话语在理论框架与方法论方面必然承袭二者的双重基因。因此,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话语体系,既要明确学科边界,又要坚守交叉学科属性,以此奠定话语体系构建的学理根基。教育话语的构建与权力结构深度互嵌,这一特点在中西话语体系博弈中尤为明显。晚清至民国时期,我国学科的设立、学术的发展、知识话语的呈现受制于国际关系秩序变动,时而仿日,时而仿德,时而仿美,形式上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知识体系,实则暗含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层延续^②,导致陷入被动调试困境,既未真正接轨西方,又使本土教育智慧被系统性遮蔽。

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话语体系,需把握三个关键点:其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教育史学话语创生的内容来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标识性概念,建立贯通古今的话语逻辑;其二,要对政治话语进行学术转译,将“立德树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新时代教育方针进行学理性转化和学科性表达,实现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融合^③;其三,立足“科举制”“书院制度”等本土案例,重构中国教育史学的主体性叙事框架,既能为理解教育治理等现实议题提供历史视角,又能在文明对话中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 道路自信

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要义,为中国教育史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价值坐标和实践指南。

教育史学的当代转型以道路自信为价值旨归,必然要求对中国教育传统与党的教育实践进行系统梳理、科学总结与继承发展。其本质上是通过提炼中国教育智慧,夯实道路自信的历史根基,引导教育史学实现从学术自洽到经世致用的功能转型,从文化传承到文明建构的价值升华,从历史阐释到战略支撑的范式创新。这不仅赋予了中国教育史学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而且为中国特色教育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依据。

具体而言,教育史学兼具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学术功能层面,它通过存史求真、传承积累构建知识根基:存史重在系统收集整理本土教育史料,以实证方法构建客观历史图景;求真通过批判性考证确立中国教育演进的内在逻辑,探寻教育历史本质;传承聚焦梳理人类教育

① 周洪宇、刘来兵:《70年教育史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与发展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0页。

③ 冯建军:《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论纲》,《高等教育研究》2024年第7期。

活动的时空脉络,揭示文明演进轨迹并传承多元文化形态;积累依托跨时空比较研究,提炼教育发展规律,在批判继承中构建理论体系,推动学术创新。^①在社会功能层面,它通过鉴往知来、育人资政实现价值转化:鉴往重在系统梳理历史经验,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思考;知来重在解析历史规律,研判教育发展趋势;育人致力转化传统教育智慧,构建价值体系;资政则是以史为鉴,为新时代的重大命题提供历史答案。^②存史求真确立本土解释范式,传承积累厚植文化自信,鉴往知来强化实践导向,育人资政彰显价值引领,四个维度协同并进,使教育史学既坚守历史客观性,又服务当前国家战略需求。

二、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动力构成

(一) 学科积淀孕育内生动能

中国教育史学学科积淀的内生动力,主要体现为教育史学科的方法论创新、文化主体性塑造、社会服务功能转化及研究者主体意识凸显四个维度。

第一,方法论创新奠定学理基础。教育史学科秉持与时俱进、多元发展的研究取向,以“问题史学”为方法论基础,将历史经验与当代教育改革需求进行深度关联。同时,积极引入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开拓了教育心态史、教育文化史、教育交往史等新兴领域,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多元拓展。此外,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也为史料处理与分析开辟了新路径。例如,借助CiteSpace等工具,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理论演变,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③第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价值支撑。教育史学科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原则,通过批判性继承中华传统教育智慧与选择性吸纳国际教育经验,强化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例如,对儒家教育伦理进行现代性诠释^④,或积极借鉴英国新社会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优化研究路径^⑤。这一双向整合平衡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服务当代教育改革需求;另一方面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凸显中国教育史学的本土特质。第三,社会服务功能转化提供现实支撑。教育史学科肩负服务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使命,通过参与改革实践、提供智库支持、普及公共史学等方式,促进学术价值向实践效能转化。例如,创造性转化儒家师道传统,提炼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为当代教师队伍建设与专业伦理涵养提供历史资源。第四,研究者主体意识凸显形成内生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体系构建历经多阶段探索:高时良提出“低层次”“中层次”和“高层次”的教育史学科框架^⑥;杜成宪将教育史学科划分为“实质研究”与“形式研究”^⑦;周洪宇将教育史学学科体系分为“具体的教育史研究”和“抽象的

^{①②} 周洪宇主编:《教育史学通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41页。

^③ 刘来兵、杨熔:《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年第1期。

^④ 夏泉源:《儒家经典教化诠释学的当代教育使命及其进路——基于中西经典诠释传统的比较与启示》,《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6期。

^⑤ 李先军:《英国新社会教育史学的解读与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年第5期。

^⑥ 高时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反思》,《教育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⑦ 杜成宪:《中国教育史学学科体系试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教育史学研究”，创新性提出“教育活动史”概念。^①学者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反思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注入学理支撑与学术活力。

（二）技术革新赋能研究实践

技术革新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关键方法支持，在史料层面夯实学术资源数据库，在方法论层面革新史料分析手段与教育史学研究范式。

一方面，技术革新实现了史料的数字化保存与高效检索，提高了资料收集效率。发掘新史料、解读新史料、构建新史实、形成新知识，是构建中国教育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②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仅将多模态史料转化为可长期保存、便于获取的数字形态，而且通过信息关联与深度匹配，构建起互联的史料信息网络与综合性数据平台，为教育史研究提供翔实的史料支撑。^③国内外已建成众多基础性历史文献数据库，如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申报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开发的“全国报刊索引”，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主持的“清史数据共享平台”，中国台湾省相关机构开发的“近代史数位资料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持的“汉籍影像数据库”等。

另一方面，技术变革推动研究从单一史实描述转向发现与解释并重，逐步丰富了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式。^④其一，SPSS统计分析、CiteSpace知识图谱、GIS地理信息系统及Gephi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技术，通过文本语义挖掘、词组频率分析和语境关键词分析等路径，精准捕捉复杂群体互动网络，定位关键人物与事件节点，实现史料信息的立体呈现。其二，数字技术通过多源史料智能关联与重组，凸显跨时空教育现象的隐形关联，从而发现很多传统文献阅读所无法呈现的新史实。^⑤例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收录从汉代至清末超过50万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为教育精英群体研究提供结构化支持^⑥；李中清、康文林团队建设的“中国大学生数据库”（China University Student Dataset, CUSD）涵盖近代中国33所高校近12万学生的籍贯、家庭背景、学业轨迹等信息，揭示教育流动与社会分层规律^⑦；梁晨团队建设的“民国清华留美生职业数据库”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爬虫程序，动态追踪学生的职业发展状况，突破了传统史料的局限^⑧。

（三）文明对话推动范式转型

全球教育对话格局的加速重构，正推动中国教育史学在知识生产、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系统性转型。

首先，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重塑了知识生产的逻辑基础。随着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公民教育等新型议题超越国界，西方中心主义教育史观的解释局限日益凸显，为话语体系构建创造了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史学亟待完成双重突破。一方面，立足本

① 周洪宇著：《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② 左玉河：《问题、史料与范式：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

③⑤ 梁晨：《从理论倡导到研究实践：数字史学未来走向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④ 梁晨：《数字技术方法与研究范式转型——以历史学为例》，《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1期。

⑥ 参见该数据库官网：<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⑦ 具体研究参见梁晨、任韵竹、李中清：《民国大学生地理来源量化考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⑧ 具体研究参见梁晨：《1909—1944年清华留美学生职业状况量化研究》，《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4期。

土,将中华教育治理智慧、现代思想精髓以及政治哲学转化为具有文明特质与普适性价值的概念框架,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历史参照;另一方面,以主体身份参与文明对话,融合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科技,在国际教育合作中贡献中国经验。其次,全球文明对话的实践需求,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并在教育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例如,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孔子学院通过语言教学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特色化教学模式,既传承中华教育传统,又提供跨文化对话窗口。最后,全球文明对话的持续深入,推动中国教育史学从知识借鉴到主动创新的范式跃迁,其本质是通过文明对话实现文化自觉,进而为构建人类教育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教育智慧。在“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教育史学话语体系实现新突破。一是拓展跨学科研究维度,增强中国教育史学教育话语的普适性;二是立足全球教育视野,提炼中西皆通的经典概念,增强学术对话包容性;三是提升话语开放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对话,向世界展现中国教育文明的当代价值,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认同。^①

(四) 国家战略筑牢制度支撑

在建设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从学术愿景上升为国家行动。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首次明确提出“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教育史学研究范式创新提供政策支持。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强调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明确“主动适应并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鼓励数字人文、计量史学等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实现在“传承中创新”。同时,指出“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教育史学通过方法论整合、问题意识聚焦与国家战略对接,将其跨学科特点转化为学科主体性的生长点,增强学科自主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核心任务之一,明确教育史学需构建“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该纲要引导教育史学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求为导向重构历史解释框架,以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推动教育史学学术体系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教育史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此外,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为培育具有跨学科视野与扎实史学功底的教育史学人才提供战略指引;《“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设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专项,将“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纳入重点项目,为教育史文献整理与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引导教育史研究深入挖掘中华教育传统的思想价值与实践智慧。

三、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回应学科范式转型的学理诉求,又要对接教育强国

^① 袁梅、原子茜:《讲好中国故事——高等教育推动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战略的现实关切,需贯通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与知识应用各环节,在服务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系统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践体系的整体构建。

(一) 知识生产:本土深耕与学科融通

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在于推动知识生产范式从传统经验叙事转向现代理论构建。这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引,一方面深植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另一方面面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并通过跨学科整合不断强化教育史学科的理论自觉。

一方面,坚持扎根中国大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构筑学科主体性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①为此,必须深耕本土教育文化基因,系统挖掘中华教育传统的思想精髓与实践智慧。具体而言,通过对历代教育典籍的梳理、对典型教育实践案例的剖析,在批判性继承传统教育思想、教育观点、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萃取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因素,进而推动传统教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着力提炼中国教育史学的标识性概念,从而构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②的学科自觉、文化自觉及学术自觉。

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切实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理论创新。其一,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升理论构建能力,通过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抽象与历史经验的批判性反思,推动教育史研究从经验叙事到原创理论的范式跃迁,完成“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③的知识创造,使其在理论层面有机融入中国教育史学知识体系,形成主体性、原创性研究范式。其二,以跨学科融合拓展方法论视野,深化理论解释力。以教育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为基础,积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构建多维解释框架,既能从书院教育实践、科举制度嬗变、儒家文化传承等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模型,拓展教育史学研究的解释边界,又能通过方法论创新,深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同时,须立足中国教育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将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挑战提炼为学术命题,促进传统教育智慧与当代现实语境的对话互鉴,为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持续注入动能。

(二) 知识创新:技术赋能与学术创新

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技术驱动与学术生产并重。前者以数字化技术赋能教育史学研究,后者通过人才培养、学科建制、学派创立、学会交流等途径构建学术生产体系,二者协同实现历史智慧对当代教育的价值反哺,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④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为教育史学知识创新注入新动能。一是通过构建数字化教育史料库,将纸质文献转化为包含文本、图像、音视频及交互元素的数字资源,实现史料的长效保存、跨地域共享与系统整合。二是借助智能语义分析系统,对海量文献实现信息自动标引和深度关系挖掘,从而精准追踪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轨迹,揭示其变迁规律,为教育史研究提供

^① 习近平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④ 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新范式。三是依托技术平台支持跨国界学术协作,通过构建多语言史料数据库和在线学术研讨平台,推动教育史学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促进研究模式由个人考证转向群体智慧共创。同时,借助虚拟仿真等技术重返历史教育场景,形成人机协同的知识创新生态。

另一方面,知识创新通过强化学科建制、鼓励学派建立、促进学会交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具体而言,学科建制,通过课程设置、考核评价、学位论文等制度化实践,既保障了学科知识的有效传承,又在形塑学术共同体、革新方法论和激发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结构性作用,从而持续推动教育史学知识体系的范式演进。学派构建为知识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各学派在坚守学科自主的基础上,通过代际传承深化理论积淀,借助差异化研究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学术视角,在学术争鸣中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保持理论创新活力。专业学会依托其学术网络,通过组织会议、设定议题与促进成果交流,凝聚学者共识,推动知识体系持续更新。

此外,强化问题意识与前沿意识的协同是知识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培养方面,融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数字人文方法,培育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现代方法素养的高素质研究队伍;在学术生态方面,通过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跨时空对话实现知识体系的更新,以学术争鸣激活教育史学理论创新,彰显其回应时代命题的实践价值;在学术评价方面,健全以高质量学术论文和专业刊物为主体的知识准入机制,通过议题设置和论文筛选,映射学科动态,引导范式创新。

(三) 知识传播:主体构建与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通过主体性构建实现话语转化的知识传播过程。该体系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内重构本土教育实践的话语秩序,对外加强全球视野中的自主性表达,最终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史学科话语体系。

就主体性构建而言,扎根本土的中国教育史学话语秩序需首先回应“谁在言说”和“为谁言说”的根本性问题。^①基于其学科属性与社会功能,中国教育史学必须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双重场域中实现话语自觉。在学术研究层面,应以“两个结合”为指引,通过深度挖掘本土学术传统、批判性继承革命文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系统推进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借鉴吸收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对历史上的教育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构建既能体现历史连续性又能回应现实需求的教育史学知识体系。在教育教学层面,通过教材编纂与课程建设,梳理传统教育文献,基于现实语境对中国教育传统进行理解构建,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传播、可教学的知识载体。就话语转化路径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②话语自觉是中国教育史学参与国际话语构建的前提。因此,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标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本土话语,并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史学科话语体系。纵向上,深入挖掘中国教育传统的话语资源,通过原创性理论构建,形成具有历史解释力的本土话语范式;横向上,批判性借鉴国外理论,将其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进行理论推演,立足本土教育实践形成学术研究范式。同时,重视国家参与的话语传

^① 刘贵华、孟照海:《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播策略，加强与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交流合作，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全球学术传播网络，充分发挥国际学术期刊、学术著作、学术会议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传播效能，扩大中国教育史知识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国经验的国际化转译。

（四）知识应用：经世致用与实践转化

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使命，在于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需系统梳理中国教育历史智慧，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活生生的实践智慧深度服务教育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①

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文化自信所承载的历史智慧与教育强国战略的深度耦合。其构建过程遵循“教育历史审视—当代价值转化—知识动态更新”的演进路径，并在资政、育人两个维度展开。在资政维度，应着力构建战略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一是系统梳理教育发展脉络，揭示其演进规律，为教育改革注入历史智慧。例如：儒家“修身”观可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伦理支撑，传统书院治理模式能为现代教育治理贡献本土经验，历史上乡村教育实验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教育实践提供历史参照。二是强化研究团队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社会组织的协同，将学术智慧转化为政策资源。具体而言，应运用数字人文技术整理散佚文献，建立教育历史智慧数据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重大教育政策进行历史溯源与效能评估，增强教育改革的合理性；畅通教育政策咨询通道，实现研究成果向政策建议的有效转化。在育人维度，着力构建应用型知识传播体系。例如：为“师道尊严”的传统注入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重塑师生关系理论；推动书院“会讲制”与研讨式教学的创新性整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课堂教学模式；汲取古代蒙学教材编写智慧，助力构建古今融通的课程体系。贯穿其中的关键是坚持批判继承与实践导向。一要坚持批判继承。通过对既有教育史学知识进行重新审视，还原其生成背景及历史演进脉络，结合当前教育实践，对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创造性重构，提升理论解释力，推动知识体系持续更新。二要坚持实践导向，主动融入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从鲜活的教育改革实践中，识别新问题、捕捉新动向，以持续的理论调适与知识重构，实现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推动教育史学在保持学科特质的同时完成方法论革新。

中国教育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是中国教育史学实现学术自立的范式革命。它以学科自主为基础，立足本土文化，整合跨学科资源，重构知识生产范式；以学术自强为内核，聚焦技术驱动与理论创新，实现学术主体性与文化生命力的双重觉醒；以话语自觉为纽带，实现本土叙事与国际传播的辩证统一，重塑教育史学解释力；以道路自信为旨归，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效能，贯通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与国家战略需求。在全球化与数字文明交织的当下，中国教育史学需坚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学术立场，既要深植中华教育文明的精神根脉，也要积极吸纳新技术、新方法与新理论；既要恪守史学求真传统，也要主动回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在文明互鉴中破除理论依附窠臼，在自主创新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范式，最终完成从学科自觉到学术自立，再到文化自信的跃升。

（责任编辑：刘启迪）

^①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Shen Guochang, Guo Yuanyuan

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takes disciplinary autonomy as basis, academic strength as core,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s bridge, and road confidence as direction. Its driving force derives from the theoretical nurturing of disciplinary accumulation, methodological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spiration of civilized dialogu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e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 and coordinate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 to promote knowledge production, drive knowledge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acilitat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with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trengthen knowledge application with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demand. Ultimately, an independent paradigm with academic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vitality will be established, propelling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oretical dependency towar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教育史研究》2026年度重点选题

1. 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与教育思想史研究
2. 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强国建设
3. 教育史“三大体系”建设研究
4. 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5. 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研究
6. 教育史课程教材教法研究
7. 新出教育史料诠释研究
8. 数智技术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
9. 教育家与教育学人研究
10. 教育史学大家治学风范及学术贡献研究
11. 中外著名大学校长研究
12. 文明互鉴与教育史研究
13. 教育史研究国际动态与评论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

2026年1月19日